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唐宋散文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王绩

王绩（585—644），字无功，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唐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后弃官还乡。简傲嗜酒，其诗文多以酒为题材。著书子东皋，自号东皋子。有《东皋子集》，并撰有《酒经》、《酒谱》。

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本文是作者的自传。文章先写他不拘小节、嗜酒如命、狂放不羁的性格，再写他无欲无为的处世哲学，并以嵇康、阮籍等人作比，进一步突出他的出世思想和愤激之情。篇幅短小，笔墨集中；叙议相继，形象突出。

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省祁县）。官至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能诗善画，工书法，精通音乐。尤其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苏轼赞其诗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有《王右丞集》。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水，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清皋，麦垅朝雉；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

因驮黄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王维晚年在蓝田辋川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这封信不仅表现了作者恬淡素雅的情趣，同时为了使朋友见信如画，引起他对山中景色的向往，作者以他诗人的眼光，捕捉住最富有特征的事物，运用清新幽隽的笔触，将山中景色描绘得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作者对色彩和声响的感受特别敏锐，他运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手法，把山居冬夜写得有声有色、有暗有明，读后使人如身临其境。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后迁居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县内）。他是唐代的伟大诗人。其诗雄奇豪放，想象丰富；其文清新峻拔，流畅自然。有《李太白集》。

与韩荆州书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荐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谩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乌菟，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推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这是一封自荐信。韩朝宗以能识拔后进而享有盛名。作者写信给他，是希望得到他的赏识和援引而踏上仕途。

在信中，作者颂扬了韩朝宗荐贤纳士的美德，介绍了自己的爱好、专长、才华，表达了愿在韩朝宗的荐举下激昂青云、大展鸿图的愿望。言辞恳切，意气如虹，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豪气，蕴含着对韩朝宗的倾慕之情。文章以情感人，因事见志，议叙结合，呈现出清雄奔放的特色。

春夜宴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

这篇短序记作者与堂弟们在春夜月下、桃花园旁，饮酒长歌、抚琴咏诗，畅叙天伦之乐的情景，表现出作者崇尚自然的浪漫情怀和热爱生活的人生况

味。

文章从浮生若游、人生短暂说到要及时享乐、快意当前，“秉烛夜游”；继写自然美景从而点明设宴地点是“桃李园”，设宴的本意是“序天伦”；再写到兄弟们相聚，并借小谢来赞美；最后写宴饮时的景色和豪情逸兴。全文起承转合，浑然圆通。词短韵长，言简意丰。

元结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等，河南鲁县（今河南省鲁山县）人。官至容管经略使，卒赠礼部侍郎。他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之一。其文格调古朴，意气超拔，其诗多反映民众疾苦。有《元次山集》。

右溪记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柱，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业，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本文记叙道州城西一条小溪整治前后的情况及作者给它命名的经过，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文章先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笔调朴实，语气平静。继而以清新细腻的笔触描绘小溪周围的胜景，“怪石”、“佳木”、“异竹”无不令人向往。但随即作者笔调一沉，感慨小溪不遇，从中也透出自己无人赏识的哀愁。最后写修理小溪，使之面貌一新，又使人为之振奋。此文因景生情，以情入景的写法对后世山水游记的写作有较大影响。

韩愈

韩愈（768 - 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官至支部侍郎。死后赠礼部尚书，说为文。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无论诗、文都是开宗立派的人才物。其文笔力雄健，诗歌格调高古。有《昌黎先生集》。

杂说（之四）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本文通篇运用譬喻说理，文章句句论马，其实句句写人；作者为千里马叫屈，其实就是在为被埋没的有志之士鸣不平。

文章篇幅短小，而变化多端、波澜起伏。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接着却从反面落笔，具体描述世无伯乐所导致的千里马被埋没的悲惨境遇，由此生发议论，愤慨之情喷薄而出。最后一段更直接将笔锋指向了驭马者。“执策而临之”短短几句使得驭马者昏聩、愚蠢、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顺势而来的两个反问句给人留下无穷回味。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为了弘扬古道、恢复传统、推进古文创作，韩愈曾公开收召后学传授古文、抗击流俗，以期扭转背师弃道的恶习，《师说》就是这一抗争中的产物。

文章说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当时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受业、解惑”，发前人之所未发。

本文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连用圣人与今人，童子习句读而择师与自身惑不解而耻师，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三个对比，有很强的说服力。

进学解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

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即，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m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浩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榑桷侏儒，椳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违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凜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徒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

《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揽其文，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文是作者在为自身鸣不平。

文章在写法上受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的启发，运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借国子先生与学生围绕“业”、“行”进行的辩论，逐步深入地展开论述。面对先生所说的只要业精行成，就会被朝廷录用的教诲，学生以先生业行卓出却毫无所用为实例进行反驳，事实上就是借学生之口颂扬先生钻研学业的勤奋、捍卫儒道的功劳、所写文章的广博恣肆和为人的成熟，把作者心中的积愤渲泄得淋漓痛快。先生最后的解答更是正话反说，寓庄于谐。先生无以复加的自责自咎，句句讽刺“有司之不公不明”，却又表现得异常庄重诚恳，无隙可击。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维天

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效，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天将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安徽省和县人。善作乐府诗，有《张司业集》。）

本文是贞元十七年（801年）作者送友人孟郊赴溧阳任县尉时所写的赠序。作者围绕“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论点，由物及人，从古到今，列举了大量事例展开论述。文章由自然现象中的不平则鸣，写到社会生活中的不平则鸣，再写到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以道鸣、以文鸣、以诗鸣、以术鸣等等。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能否善鸣，是鸣国家之盛还是自鸣其不幸，由天意所决定。作者以此劝慰孟郊，同时抒发他们所共有的怀才不遇的悲愤。行文纵横奔放，寓意含蓄深远。

送董邵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疆仁者，皆爱惜焉，蚩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的现象十分严重。董邵南屡试不中，准备到河北藩镇幕府中去任职。忠君尊儒、拥护大一统的韩愈，同情董邵南的处境，却反对董生此行，他不便明言，便以此序相赠。

文章先赞扬河北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祝愿董生此行能遇到机会。但随即宕开一笔，认为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即使“有合”，也是与藩镇相合，自然不足取。最后作者又借古喻今，借请董邵南邀请燕赵之士归效朝廷来婉言挽留他。文章一波三折，委婉含蓄，微情妙旨，

溢于言外。

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峻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越趋，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上，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本文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其时唐王朝逐渐衰颓，藩镇割据日益严重，战乱不休。作者正从战乱中脱险归来，在京师求官。他借送李愿归隐之机，抒发了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作者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对三种不同的人物进行了生动地刻画。他讽刺当时权贵的骄横霸道，穷奢极欲；赞美隐士洁身自爱、超凡脱俗，嘲笑势利小人追逐名利、阿谀奉承，丑态百出。文章人物形象鲜明，文笔骄散结合，抒情意味颇浓。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

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歿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南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歿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夭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选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歿不能抚汝以尽哀。斂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局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这篇祭文倾诉了作者对亡侄的无限哀思，同时也饱含了自己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韩愈自幼丧父，依靠兄嫂为生，与侄儿老成感情极深。作者大胆摈弃了已成抒情桎梏的四言韵文和骈文的写法，采用自由抒情的散文形式，叙写了他身世的不幸，家景的凄凉，兄嫂的抚育，同侄儿相依为命的情景，以及十二郎死后的善后事宜。文章字字血泪，处处动情，情之所至，不假修饰而无处不工，叙事自然真切，情感深厚真挚，句式长短错落，是“祭文中千年绝调”（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柳子厚墓志铭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爽，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

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雋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侷，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同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诋诃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是韩愈应刘禹锡之请而作。文中记述了柳宗元的生平，并对其一生作了扼要评论。其中特别赞扬了柳宗元的杰出才干和优秀品德，充分肯定了他在贬滴期间的政绩和文学成绩，表彰了他的“以柳易播”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自然流露出了作者的种种现实感慨和对柳宗元的坎坷境遇的同情惋惜。

作者精心选材，运用具体典型的事例来突出人物品格。描绘柳宗元交友厚道，着重记述了他“以柳易播”，并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将此事与现实中小人见利忘义的行为进行对照，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作者还突破了墓志铭一味赞美的模式，褒贬并举，丰富了墓志铭的内容。作者认为死者的困顿遭遇是促使他获得巨大文学成就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十分深刻。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后贬为被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后迁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世称“柳河东”、“柳柳州”。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韩愈并称“韩柳”。为文众体兼备，意畅意美，雄深雅健。有《柳河东集》。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殍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元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邪？”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本文写于永州。它通过记述永州一带山民为免除赋税而争相冒死捕捉毒蛇这一触目惊心的现象，反映了横征暴敛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作者轻徭薄赋，救民于水火的思想。

文章始写异蛇之奇毒，继写山民争相冒死捕捉。说明与叙事手法并用，行文简洁。中问写蒋氏答问，以“吾祖死于是”入题，是从泰山妇答孔子问的话脱化而出，与结尾所引孔子之语相呼应。文中写蒋氏的自陈心曲，反复运用对比烘托手法，使赋敛之毒与异蛇之毒形成强烈反差，含无限悲凉之意。对于“悍吏下乡”的细节描写极为传神，句式错落有致，富有变化。结尾的议论，似画龙点睛，使作者的观点更鲜明。

段太尉逸事状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那州，纵士卒无赖。那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赚，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屈瓮盎盈道，

袒臂徐宏，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个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嫠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邪？副元帅固负若属邪？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拆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大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人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邪？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蔡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

于执事。谨状。

作者写这篇“逸事状”，是为了给史官撰写段秀实的传记提供材料。由于本文史实可靠，剪裁得当，文笔生动，后来的《新唐书》在为段秀实立传时几乎采用了本文所提供的全部材料。

文中选择了段太尉的三件逸事，从不同侧面来刻画人物性格。斩杀为非作歹的士兵十七人，迫使郭晞整饬军纪，显示出段太尉的胆识；为农民敷药喂饭，显示出段太尉的慈爱，拒收朱泚的财礼，显示出他的廉洁正直，对朱泚早有防范之心，因而后来以笏狠击朱泚并非一时意气所致。三件事中，作者正面详写第一件事，略写后两件事，叙事有主有次，情节有张有弛。

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

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盼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氏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勸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命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这是一篇传记，也是一篇寓言式的说理文。文章借种树人郭橐驼之口，反映了当时官吏政乱令烦、骚扰百姓的现实，提出了作者顺民天性的治国主张。

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按照传记的要求，扼要介绍郭橐驼名字的由来、籍贯和特长。第二部分记郭橐驼的种树经验，着重强调他“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行为，并用其他种树者的倒行逆施加以映衬。第三部分将郭橐驼的种树之道“移之官理”，议论怎样为官。文章把“养树”与“养人”联系起来，将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第四部分交代写作此文的目的和意义。文章结构严密，譬喻生动，议论精当，说理透彻。

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

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滴瀟水上，爰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本文是作者为他的《八愚诗》写的序文。全文由“愚”字入手，紧扣“愚”字展开描绘、议论。首段叙述愚溪得名由来，并顺笔交代作者受贬居此的经历。第二段照应《八愚诗》题，详述愚溪八景的方位和特征，再一次点明八景之名出自作者之愚。第三段进一步阐述溪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溪的“无利于世”写到自己无用于世。又引宁武子、颜子为佐证，表面上责备自己之愚，其实是正话反说。痛苦与愤懑之情溢于言外。最后一段由溪虽“无利于世”却自有本色，转入自己“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从物之智与用，写到自己的智与用。文章时写愚溪，时写“愚”人；时绘愚溪之景，时抒愚人之情。溪、人相合，感慨深沉。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岷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写有八篇山水游记，被统称为“永州八记”。本文是其首篇，在文中交代了他出游的背境，在“八记”中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

文章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写起，从中透露出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然后由一般的游览顺势引出西山，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巧妙地突出它的怪特，绘出一幅山水重叠、气象浩渺、境界壮阔的鸟瞰图。文章先写“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继写“始指异之”，最后以“游于是乎始”收尾。抓住“始”字，层层铺垫，环环相扣。文笔自然，意境清远。

钴鉤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鉤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代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濛濛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沆、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本文为“永州八记”中的第三篇，写鉤潭西小丘奇异的景色和它为人所弃的遭遇，以及作者由此所产生的感慨。文章开头，照应前两篇游记，以作者的行踪，点出钴鉤潭和小丘发现的经过、方位等。文中接着详细描绘小丘山石之奇，运用拟人、比喻等手法，赋予乱石以情感意志，化静为动，把它们写得活灵活现，充满生命力。经过“铲刈秽草，代去恶木”后的小丘，特异之处更为显著。作者一连用了四个“谋”表达出他陶醉于其中的感受。文章就小丘的遭遇展开议论，实质上是作者触景生情，借此吐露自己的抑郁之情。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佶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第四篇。文章从潭的发现经过写起，潭未出，先写潭水声“如鸣珮环”，因声造境，以示萧疏幽深。接下来写潭的形貌，扣住“石”字，接连用四个比喻，绘出近岸石块之奇特。同时用岸上的藤蔓进

一步烘托出潭上清幽的氛围。作者以实写虚，着重展现潭水的清冽。文中句句写游鱼之历历在目，也句句写出潭水之清澈空明；既写游鱼之乐，更见游者之乐。文章写潭边小溪，虽然简略，却异常生动，有动有静，有明有暗，隐隐约约，颇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其境过清”一句，不仅回应了小石潭清冷的特色，也透出了作者当时的心情。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居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曾任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其诗与白居易齐名，时称“白刘”。为文巧丽渊博，论说透彻。有《刘梦得文集》。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灿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东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欤！

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至九年，为名进士。十有九年，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称首，入尚书，为礼部员外郎。是岁，以疏雋少检获讷，出牧邵州，又滴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归。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某曰：“我不幸，卒以滴死，以遗草累故人。”某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

子厚之丧，昌黎韩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于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之言为然。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刘禹锡受亡友柳宗元之托，为他编辑遗稿，事成之后，便写了这篇序言。

文章先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写起，认为国家的统一对文学的繁荣有推动作用，顺势引出柳宗元的文章在当时就备受注目。接着用极其简略而婉转的语言介绍柳宗元的生平及与自己的友情。最后引用韩愈和皇甫湜对柳宗元的看法业表达自己对亡友的推崇之意，充分肯定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地位。文章语言雅洁，情感婉曲，脉络清晰，过渡自然。

皇甫湜

皇甫湜（zhí）（777—835），字持正，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是“韩门弟子”中有名的古文家。为文尚奇。《四库全书简目》说：“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愈文谨平而奇崛，翱得其谨平，湜得其奇崛。”有《皇甫持正集》。

顾况诗集序

吴中山泉气状，英淑怪丽，太湖异石，洞庭朱实，华亭清曠，与虎丘、天竺诸佛寺，钩绵秀绝。君出其中间，翕清轻以为性，结冷汰以为质，煦鲜荣以为词。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

君字逋翁，讳况，以文入仕，其为人类其词章。尝从韩晋公于江南，为判官，骤成其磊落大绩。入佐著作。不能慕顺，为众所排，为江南邵丞。累岁脱縻，无复北意，起屋于茅山，意飘然，若将续古三仙，以寿卒。

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鞞头，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鹭也。既接欢然，以我为扬雄、孟轲，顾恨不及见。三十年于兹矣，知音之厚，曷尝忘诸。去年，从丞相凉公襄阳，有白顾非熊者在门，讯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诗集二十卷，泣示余发之。凉公适移莅宣武军，余装归洛阳，诺而未副，今又捻矣，生来速文，乃题其集之首为序。

本文是作者于太和三年（829），为他的前辈诗人顾况所写的诗集序。作者对此文颇为自负，当时也广为传诵。

文章开篇由吴中的山灵水秀写到生长其间的顾况的倜傥俊爽，以山水的清新村出诗人禀性的不凡，再由此写到顾况诗歌的新奇高妙。山水、诗人与诗风连成一体，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在简单叙述顾况困顿的经历后，文章着重描述了作者三十年前为童子时所见的顾况，使一清高绝俗、风流自然的诗人形象跃然而出。此序简洁平易，形象鲜明生动。在皇浦湜之中别具风格。

李翱

李翱（772—844），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一带）人。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他是韩愈的高足，当时的古文名家之一。为文尚气质，重独创。文风优游凝重，平直中隐有波澜。有《李文公集》。

杨烈妇传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将盗陈州，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会于陈州。

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曰：“君，县令。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谁守？”侃曰：“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杨氏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廩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

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杨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许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贼者，与之千钱；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贼者，与之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

杨氏亲为之爨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使侃与贼言曰：“项城父老，义不为贼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侃伤而归。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乎？”侃遂忍之，复登陴。

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率其徒将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其帅，希烈之婿也。贼失势，遂相与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刺史上侃之功，诏迁绛州太平县令。杨氏至兹犹存。

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姊妹，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难。厥自兵兴，朝廷宠族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杨氏当之矣！

赞曰：凡人之情，皆谓后来者不及于古之人。贤者古亦稀，独后代耶！及其有之，与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杨烈妇者，虽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惧其行事湮灭而不传，故皆叙之，将告于史官。

本文是作者的精心之作。它记述了一位县令的妻子，在叛军兵临城下，举县不知所措之时，挺身而出，发动胥吏百姓进行抵抗。以弱胜强，击退叛军，保住了城池。作者曾在《答皇甫湜书》中自信地写到：“仆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新唐书·烈女传》所载杨烈妇之事与本文大抵相同，当以此文为据。

文章选取了人物的典型言行来塑造人物性格。杨氏与夫君杨侃的对话，显示其“忠”；对胥吏百姓的激厉，显出其“智”；对李侃轻伤下城的责备，显出其“义”。作者最后将杨氏的勇忠智义同文臣武将“弃城而走”的行为对照起来阐发主旨，不仅使杨氏形象更为突出，对现实的批判也更为深刻。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省），后迁居下邳（今陕西省渭南）。因触怒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后官至刑部尚书。他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其诗通俗平易，散文晓畅清新。有《白氏长庆集》。

荔枝图序

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这篇序是作者于元和十五（820）年任忠州刺史时所作。

文章先交代荔枝的产地，然后着重描绘荔枝的形态，采用以物喻物的手法，对荔枝的树形、叶、花及果实的外形、核、膜、瓤、浆液给予细致而形象的说明。说明时按照由大到小、由外到内的顺序，层次清晰、言之有序。最后交代荔枝极难保存的特点，点明画图为序的目的所在。文章语言质朴，

重点突出，博喻精彩，给人留下鲜明具体的感受。

庐山草堂记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

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任，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墙，污而已，不加白。碱阶用石，罽窗用纸，竹帘绉帟，率称是焉。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块，杂木异草，盖复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飪，好事者见，可以永日。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泻阶隅，落石渠，昏晓如练色，夜中如环佩琴筑声。堂西依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息，自檐注砌，累累如贯珠，霏微如雨露，滴沥飘洒，随风远去。其四傍耳目杖屦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

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簣，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稳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

矧予自思，从幼迨老文，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复簣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扣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听，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

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有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白居易在仕途上受到排挤和打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锐气受挫，不免放情山水。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草堂建构经过，描绘了草堂四周秀丽的风景，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当时失意的思想情绪。

文章从修建庐山草堂的缘起入手，先具体介绍草堂房屋的建筑情况及堂中因陋就简、朴素高雅的陈设。然后转入对草堂四周迷人景色的铺写，以空

间方位的转换为序，细致地描写方池平台、山竹野卉、飞泉悬瀑、杂木异草等。又从景物说到自己恬静安适的心情，表达自己乐天安命、归隐庐山的愿望。文中对草堂周围自然风光的描绘，细致入微、生动形象。文章行文井然有序，叙述错落有致，语言清新晓畅，恬静安适之中透露出拓落不平之气。

三游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马授虢州长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与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参会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比，将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洒酣，闻石间泉声，因舍棹进策，步入缺岸。初见石，如叠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见泉，如泻如洒。其奇者如悬练，如不绝线。遂相与维舟岩下，率仆夫芟刈芜翳，梯危缒滑，休而复上者凡四、丘焉。仰睇俯察，绝无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自未讫戍，爰不能去。俄西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莹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名状。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将去，怜奇惜别，且叹且言。知退曰：“斯境胜绝，天地间其有几乎？奈之何俯通津，绵岁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为长太息，岂独是哉？”微之曰：“诚哉是言！矧吾人难相逢，斯境不易得，今两偶于是，得无述乎？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纪之。又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洞在峡州上二十里北峰下，两崖相嵌间。欲将来好事者知，故备书其事。

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从江州出发，溯江而上赴忠州任刺史，与好友元稹在峡州夷陵不期而遇。其时白行简随兄白居易同行，三人在夷陵盘桓三天，同游夷陵山洞。本文即记其事。

文章先写相会之经过，随即详细记述游赏之乐。从听觉入手，写闻泉声而舍舟登岸。接着从视觉着色，写所见巉岩怪石，奇泉飞瀑。最后写峡山迷人夜景，引出“怜奇惜别”之叹。由胜境罕有游者，无人赏识，联想到人才往往被埋没，寄托自己身世之感。文中绘景生动如画，叙事简洁明了，抒情委婉含蓄。

杜牧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历任监察御史，黄、睦、湖诸州刺史等，官至中书舍人。诗与李商隐齐名，有“小李杜”之称，风格清新俊爽，情韵深长。古文多感时之作，笔力峭健。有《樊川文集》。

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牧曰：“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篋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

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觞一饭，显显然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尝恨想其人，咏味其言止矣！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收其夕不果以书道不可，明日就公谢，且曰：“世谓贺才绝出于前。”让居数日，牧深惟公曰：“公于诗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贺之得失短长。今实叙贺不让，必不能当公意，如何？”复就谢，极道所不敢叙贺。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牧因不敢复辞，勉为贺叙，终甚惭。

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贺死后几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

李贺英军早逝，十五年后期友沈子明整理其遗稿汇为诗集。此序便是杜牧应沈氏之诗而作。杜牧在序中讲述了自己撰写序文的起因，生动地描述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同时也指出了诗人辞胜于理的弱点。本文形式上是篇序，实际上是篇情文并茂的文艺论文。文中运用富有气势的排比，以绵联的云烟、风樯阵马、瓦棺篆鼎、时花美女、牛鬼蛇神等特征鲜明的事物形容李贺诗歌丰富的内容，多变的形式，诡奇的构思，瑰丽的风格，生动贴切，文采飞扬，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商隐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樊南生，又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曾任县尉、秘书郎和节度使判官等职。他是晚唐杰出诗人。其为文章，瑰迈奇古，自成一派。有《玉谿生诗集》、《樊南文集》。

李贺小传

京兆杜牧为李长吉集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世传之。长吉姊嫁王氏者，语长吉之事尤备。

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所与游者，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辈为密。

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驢，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云。长吉往往独骑往还京、洛，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故沈子明家所余四卷而已。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

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欷下榻叩头，言：“阿妈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噉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直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没有详叙诗人生平，而是选择一两件逸闻轶事，从侧面烘托渲染，描绘出一奇特诗人的形象。

本文通篇围绕一“奇”字展开。先说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然后写李贺形貌之奇：“细瘦，通眉，长指爪”。再写他作诗之奇：“未尝得题然后为诗”，骑驴觅诗，呕心苦吟。接着写他临终之奇：天帝征召，烟气勃勃，噉管声声。最后就“奇才”的遭遇展开议论，用一连串的反问句，表现出作者对诗人坎坷遭遇的同情和惋惜、不平与愤懑。文章构思奇特，议论深刻。

孙樵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自称关东人。曾官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他随僖宗奔峻陇，迁职方郎中、上柱国。孙樵受韩愈影响甚深，是后代古文运动后期的著名代表。其文以奇崛见长。有《孙可之集》。

书何易于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筦，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划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令划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宁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有垂白楼仗者，易于必召坐食，问政得失。庭有竞民，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改编州罗江令，其治视益昌。是时故相国裴公刺史绵州，独能嘉易于治。尝从观其政，道从不过三人，其察易于廉约如是。

会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状者，且曰：“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战？”樵曰，“易于督赋如何？”曰：“上请贷期，不欲紧绳百姓，使贱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费不足，

遂出俸钱，冀优贫民。”“馈给往来权势如何？”曰：“传符外一无所与。”“擒盗如何？”曰：“无盗。”樵曰：“予居长安，岁闻给事中校考，则曰：‘某人为某县，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问其政，则曰：‘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盗，反若若干盗。’县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对，笑去。

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皆知求才为切。至如缓急补吏，则曰：“吾患无以共治”；膺命举贤则曰：“吾患无以塞诏。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继而言之，使何易于不得于生，必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本文是一篇颇有特色的人物传记，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以叙事为主，正面写何易于。后一部分记述了作者与邑民的一段对话，从侧面在写何易于。

在叙事方面，作者采用了虚实相生，点面结合的方法。文中着重记述了何易于在为“益昌令”时的勤政清廉，而对其为“罗江令”的情况，只以“其治视益昌”一笔带过。在记述其在益昌的作为时，又重点记述了何易于为刺史引舟和毁诏不征茶税两件事，对于他问政于民等事迹只是略写。这样安排，使文章显得布局合理，剪裁得当，结构严谨。

书褒城驿壁

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及得寓日，视其沼，则浅混而茅，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乌睹其所谓宏丽者？讯于驿吏，则曰：“忠穆公尝牧梁州，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龙节虎旗，驰驿奔轺，以去以来，鞞交蹄鬪，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汨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凡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曩类。某曹八九辈，虽以供馈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

语未既，有老叟笑于傍，且曰：“举今州县皆驿也！吾闻开元中天下富蕃，号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粮，长子孙者不知兵。今天下无金革之声，而户口日益破，疆场无侵削之虞，而垦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财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县令而已，以其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则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m，当饥饱鲜，囊帛橐金，笑与秩终。”

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予既揖退老叟，条其言，书于褒城驿壁。

这是一篇讽刺性杂文。作者借褒城驿吏之口，说明驿站残破的原因，在于来往宾客毫无爱惜之心，官吏差役蛮横自私、滥用无度甚至肆意破坏，进而借老叟之口指出晚唐的衰落在于朝廷更换官吏过于频繁，而贪官污吏把州县看作驿站，忙于掠夺财富却不尽职治民。作者由此抒发感慨，感叹朝廷官制的不善和任用非人，透露出对国家衰弱的深切痛心。文章采用了因小见大、

由近及远的写法，由驿站的管理借题发挥，探讨州县的治理，层层深入，逻辑清晰，使人信服。

皮日休

皮日休（834—883），字逸少，后改为袭美。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曾隐居襄阳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吟先生。历任著作郎、太常博士。后参加黄巢起义军，不知所终。其文宗韩愈，多采用小品文形式，笔锋犀利。有《皮子文藪》。

原谤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于君乎？况于鬼神乎？是其怨訾恨讟，徒倍于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国者，可不慎欤？故尧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谤。殊不知尧慈被天下而不在于子，舜孝及万世乃不在于父。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则民扼其吭，摔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

本文由天对民“至仁”，而民常怨恨它；进一步写到尧舜这些圣王如此贤明，却依然遭到毁谤；从而警告当世之君，行为不端就会被驱逐灭族。文章行文逐层递转，感情渐趋愤激。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读司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

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土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

由是编之为术，术愈精而杀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呜呼，其亦不仁矣！

蚩蚩之类，不敢惜死者，上惧乎刑，次贪乎赏。民之于君，犹子也。何异乎父欲杀其子，先给以威，后啖以利哉？

孟子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使后之君于民有是者，虽不得土，吾以为犹土焉。

本文首先大胆地指出当今帝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百姓屠杀的基础上的。接着通过古今对比，以魏晋为例，分析统治者是如何牺牲民众来争夺领土，换取天下的。由此推出战术兵法只是屠杀百姓的工具的结论。作者最后还提出了得民即是得天下的观点。文章写于战祸不休的晚唐，有很强的针对性。

陆龟蒙

陆龟蒙（？—881），字鲁望，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曾任苏州、湖州两郡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与皮日休齐名，

世称“皮陆”。其文尖锐泼辣，颇多愤世嫉俗之词。有《笠泽丛书》、《甫里集》。

野庙碑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疇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皙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鸢室其间；车马徒隶，从条怪状。疇作之，疇怖之。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鸡犬。鱼菽之荐，牲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也。一日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疇不曰适丁其时耶？疇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降级，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载车马，拥从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欧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恟挠脆怯，颠蹶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语之土木耳，又何责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乱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飨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碑文一般都用来记述功德，本文却托物寄讽、借题发挥，确属别开生面。文章以“悲”字为线索贯穿全文。作者先从碑的来历写起，引出“悲”，接下来描述民众祭神祀鬼的行为，为他们愚昧无知、自我愚弄而悲哀。然后笔锋一转，直指贪官污吏，认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木偶，受着百姓的供奉，凶狠、贪婪、残暴，却又怯懦无能，不仅不能救民于水火，一旦国难当头，更是“乞为囚虏之不暇”，令人悲愤。最后文章以诗作结，进一步深化主题。作者独运匠心，精心构思，妙用映衬对比手法，托讽土木，对举成文。文章句式多变，善铺陈渲染，嬉笑怒骂，酣畅淋漓。

罗隐

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省城阳县）人。少负文名，屡试不第，蹇偃困顿。晚年依附吴越王钱镠，颇受器重。其文多刺时政，笔力俊拔，议论风生。有《罗昭谏集》。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屦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国家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这是一则讽刺小品。文章抓住刘邦、项羽无意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无情地嘲讽了这些打着救民旗号的英雄们，揭露了他们为一己私利争夺天下的真实面目。

文章先写动物之所以有隐藏和保护自己的本领和方法，是“防乎盗也”，由此类推到人，分析人类社会中的“盗”与常人的异同，指出“盗”之为“盗”，在于他们不能长久地保持好的本性。而“窃物之盗”与“窃国之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至此“英雄”的面目暴露无遗。文章最后扩大讽刺范围，将矛头直指所有的统治者。这种思想出现在藩镇割据、争权夺利的晚唐，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禹偁

王禹偁(ch n)(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曾任右拾遗。以刚直敢谏著称，屡遭贬谪。为文反对浮靡，提倡平易朴素之风。其诗文多针砭时政，为后来诗文革新运动开辟了道路。有《小畜集》、《小畜外集》。

黄冈竹楼记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剖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濼，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幹、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日记

本文先简单记述了竹楼的修筑，然后重点转入对竹楼周围幽美风景的描写，突出居住其中的优雅闲适的情趣。特别是在描写竹楼的清音雅韵时，作者连用六个“宜”字，排比而下，颇富诗意。文中还以帝王的豪华楼台来反

衬其对竹楼的喜爱，表现他的高雅淡泊。最后由竹楼的寿命自然地引出作者飘零的身世，抒发他心中的郁闷。此文是作者贬官黄州时所作，文中对谪居乐趣的强调，实质上是他屡遭打击后的一种消极反抗。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北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提出许多改良政治的进步措施，主张积极抵御西夏侵扰。诗文慷慨悲壮。有《范文正公集》。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期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本文是作者应滕子京之请所作的一篇记。文章在简述了岳阳楼重修的背景、经过后，详细描述了洞庭湖的两种景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情怀，着重阐发了自己的忧乐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滕子京共勉。

文章叙议结合。先由“观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引出对洞庭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壮观景色的描绘，再由“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带出登楼所见的不同景象和胸中萌生的悲乐之感，最后就“古仁人之心”作论，表明自己的人生追求。文章叙议转换自然，句式亦散亦骈，铺陈描绘多用骈句，叙议抒情多用散句。偶尔用韵，读来音韵和谐。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他领导了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在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其散文明白晓畅，舒展自如。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史学著作《新五代史》等。

与高司谏书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弱，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然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

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景佑三年（1036），锐意改革的范仲淹几次上疏揭露朝廷弊端，批评宰相进用私人，结果激怒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当时朝中多人论救，谏官高若讷不置一词，反而在私下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这封信，指责高若讷，结果被贬为夷陵令。

信先追叙十四年间作者对高若讷为人的三次怀疑，肯定他不是一个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再直接分析高若讷诋毁范仲淹的不良用心，指出无论范仲淹是贤还是不贤，作为谏官的高若讷都应为此受到责难。而他对范仲淹的诋毁就是在“饰己不言之过”，欺骗世人。文章层层深入，义正词严，感情激愤，抨击斥责酣畅淋漓。

伶官传序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暂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这是一篇史论性散文，论事说理感情充沛，颇具感染力。文章首先亮出国家盛衰成败由于人事的观点，接着分析庄宗得失天下的事例，既写其极盛的形势，又写其极衰的场面，一扬一抑，旨意显豁。最后以议论收束。层层推进，条理清楚，结构严谨。文中恰当运用对比，得与失、盛与衰、人事与天命、难与易、忧劳与逸豫等对比贯穿始终，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感叹句、反问句的运用使文章一唱三叹，颇具抑扬顿挫之美。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

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这篇游记是作者贬官滁州后所作。全文以“乐”字为线索，写作者体会到的山水之乐、醉中之乐，以及与民同乐之乐，洋溢着一种悠闲自得、轻松愉快的情调，透露出作者官场失意后寄情山水的闲适心理。

本文把人物活动和山水放在一起描写，既写山水之美，更写山水之美引起的人心之乐。写景则始写“环滁皆山”，继写“西南诸峰”，再写琅琊山、酿泉，最后写到醉翁亭，层层渲染，风景如画一般展现出来。写人之情，则引出醉翁，点出“醉翁之意”；细写山间四时、朝暮风光，突出“醉翁之乐”。最后由众人之乐写出太守心中之乐、与民同乐之乐。文章写景有声有色，抒情委婉曲转，富有诗情画意。句式参差错落，连用二十一个“也”字，更使文章情思流溢、韵味十足。

苏氏文集序

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为十卷。

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相撻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

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后为湖州长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

庐陵欧阳修序。

本文开篇先交代苏舜钦文集的编录过程，引用作者对杜衍的一段话，充分肯定苏文的价值。随即荡开一笔，回顾古文运动的历史，探讨文章与政治的关系。指出社会治少乱多、缺乏人才是古文难兴的重要原因，从而衬出苏舜钦是位难得的人才。他被无端废弃，实在令人惋惜。文中还介绍了时文风行时，苏舜钦不顾世人非议、嘲笑，始终坚持古文创作的事迹。作者将人与文结合起来，既赞其文，又颂其人。最后再用对比手法写出苏舜钦的悲惨结局，为其抒写不平。文章低徊深沉，情感浓烈，令人神伤。

祭石曼卿文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个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嶮峨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儿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飨！

这篇祭文写在石曼卿逝世 26 年之后。全文以三呼曼卿来组织内容，抒写对亡友的怀念之情。一呼曼卿，谈人与万物虽同有生死，但人有名可传不朽，暗示曼卿有言足于不朽，似乎大可可悲。再呼曼卿，哀叹他生前才能出众，死后本应化作金玉之精等，而今墓地却一片荒凉。但“自古圣贤亦皆然兮”，似乎也不必生悲。三呼曼卿，说盛衰之理虽是这样无情，但他却不能忘情。文章虽从人死不足悲入手，结穴处却是不能不悲。全文一波三折，情感真挚浓烈。骈散兼施，一韵到底，读来婉转起伏，更增加了悲凉凄怆的气氛。

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王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这是一封奏章，主要阐明两人观点：一是朋党自古有之，问题的关键是人君要善于辨别出哪些是由君子结合成的朋党，哪些是由小人结合成的朋党；二是人君不但要善于辨别，更要进用君子之朋，黜退小人之朋。在写法上，文章开篇就提出总的论点，接着剖析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然后通过征引六件史实，证明人君进用君子之党，国家就兴，坑害君子之党，国家就亡。最后提醒宋仁宗从历史事迹中吸取教训。文章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行文婉曲，有很强的说服力。

苏洵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屡试不中，二十七岁发愤苦读，终于名动天下，受人推荐为校书郎。他擅长作论辩文。其文格调高古，雄健犀利。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有《嘉祐集》。

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

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刀割，以趋于亡。为国者勿使为积威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篇史论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探讨它们对付秦国应该采用的正确策略，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希望北宋统治者在对待契丹、西夏的问题上，不要重蹈六国赂秦而亡的覆辙。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接着用两段文字分别论述赂秦之国与没有赂秦的国家灭亡的具体原因，以见出赂秦致祸的严重性。然后指出六国要避免灭亡，就应重用智谋之士，联合抗秦，不要被秦国的积威所吓倒。这正是作者认为当今“为国者”所应吸取的历史教训。最后宕开一笔，巧作议论，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对朝廷的妥协退让政策提出批评。文章切中时弊，说理生动，布局严密，行文老辣，议论深刻。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常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

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而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作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嘉祐元年（1056），作者重游京师，向欧阳修写了这封自荐信，倾吐自己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心情，介绍自己学习古文的经过，以求得对方的援引。

文章由对方的生活经历、文章特点说到自己十年仰慕、十年学“道”的经历，顺势托出希望援引之意，很容易打动人。史载欧阳修见到作者的信和其它文章以后，便极力推荐，遂使苏洵成名。文中写作者在学习古文时不同阶段的不同感受，生动细致，颇能启发人。他对于各家文章的评价，也十分准确。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省道县）人。曾任州县地方官，后退居庐山莲花峰下，世称濂溪先生。他是宋代有名的哲学家，

理学中濂洛学派的创始人。程颐、程颢都是他的学生。有《周子全书》。

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本文意在托物言志，借对莲花的颂赞，表现作者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和理想。文章体物入微，咏物精工。其中一节连用五个“不”字，不仅栩栩如生地表现了莲花的外部特征，同时也传神地揭示了它的内在品质，做到了形神兼备。骀散句式交错运用，读来铿锵悦耳，顿挫有致。

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曾在史馆编校书籍，后官至中书舍人。所作散文含蓄典重雍容平实，尤以文字明洁、结构严谨著称。对后世古文家有一定影响。有《元丰类稿》。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遗迹，岂信然耶？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耶？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

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后世者如何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本文是作者为江西临川古迹墨池所写的一篇记事文。墨池，传说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砚涮笔的水池。文章简单地介绍了墨池所处的方位、形状及其来历，说明王羲之书法精妙，在于他“以精力自致”，而“并非天成”。藉此推言：人要有一能，勤奋尚不可少，而要“深造道德”，学习就尤为重要了。此记是应州学教授之请而写，作者由书法练习引向道德修养，以勉励州学学生，非常切题而衔接自然。文章语言平淡冲和，叙述从容周详，借事立论小中见大。许多问句的出现，更发人深思。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官至参政知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推行新法，被两次罢相。他是宋代著名的改革家，也是杰出的散文家，其文拗折峭劲。有《临川先生文集》。

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游记。作者通过记述游褒禅山所见的碑文残字和一次半途而废的游洞活动，讲明两个道理：一是世上“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人须有志、有力、有外物相助，方能到达；二是学者求学“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切不可听信传说。

本文名为游山，实为寄志。凡是与议论、主题有关的游览活动就详写，反之就略写，意之所至，笔亦随之，详略得当，结构严谨。前两段的记游为后面的感慨议论提供了材料依据，后两段的抒发又揭示了记游的意义和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记游议论，融为一体。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在北宋党争中，屡遭贬谪。谥号文忠。他在诗、词、散文、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文笔挥洒自如，似行云流水。有《东坡七集》、《仇池笔记》等。

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于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倔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胜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欲！

这是作者应制科考试时所上《进论》中的一篇，主要就张良得书于圯上老人一事进行评论。作者认为圯上老人使张良成就大事的不是书，而是磨砺了他能忍的性格。文章开篇总括全文大意，指出大勇之人，在于有过人之节。下面三段以此为中心围绕老人的言行有警戒之意展开分析。作者先就授书一事略下结论，然后用“其意不在书”转入对秦时恐怖形势的介绍，指出张良不能忍所造成的危急处境，从而引出老人使其能忍的用心。第二段引用史实作为陪衬，强调“忍”的必要性。第三段再以张良教高祖能忍，佐其成就大事来回应论点。文章结构严谨，文笔奔放，收束稳妥自然。

答谢民师书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失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

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惊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这封信是作者遇赦从海南北归，在船中写给谢民师的。作者在信中叙述了自己北上的踪迹，吐露了当时惘然若失的心绪，并借评谢民师的文章阐述了一些文论观点。

作者提出文章要写得自然、生动，不可忽视文辞在文章中的作用。他认为文章“言止于达意”与重视文辞是统一的。而文要“达意”至少要具备两点：一是“了然于心”，对事物要有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二是“了然于口与手”，要有充分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他还批评了扬雄那种内容浅易、文句艰深的文风，赞扬了屈原、贾谊辞赋的文辞条畅。此信的风格和作者论文的观点一致，语气亲切，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

文与可画筧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繄腹蛇蚺，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斲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筧筧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筧筧谷在洋州，

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笱篔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这是一篇画记，也是一篇哀悼文字。作者睹画思人，抚今追昔，通过记叙文与可的为人、画竹的特点，追忆多年来两人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寄托哀思。

文章先从文与可教作者如何画竹写起，记录了文与可的画竹理论。继而写到文与可赠画，及围绕赠画二人在信中吟诗唱和的种种趣事。最后点出作此文的缘由。三段文字，谈画理，写趣事，述谑语，叙事议论，挥洒自如。文章看似散，实则是形散神不散，通篇都在借画竹吟竹表现对文与可的缅怀之情。中间一段文字写得可喜可乐，实际上是借乐事衬写哀情，以倍增其哀。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酈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叩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鹤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这是一篇考证式的游记。作者在文中记述了自己深入地，考察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对前人的说法做了补充和辩驳，并由此得出结论：凡事不耳闻目见，不可臆断其有无。

文章由疑起笔。开篇介绍前人对石钟山得名原因的分析，并略加反驳，以引出下面记述他实地考察的文字。中间细述他夜泊绝壁之下的见闻感受，把潭上的夜景写得有声有色。文中对石洞、石缝、中流大石及各种奇异声响的描写更是生动传神。结尾作者因事兴叹，抒发议论，水到渠成。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间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鹄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间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本文是篇颇有特色的传记文。它通篇不叙传主的世系、生平，只挑几件突出的事来写传主为人的特点。文中叙事虽少，却将方山子作为侠士、隐士的形象刻划得栩栩如生。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安排颇具匠心。在选材上，他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动作、神态加以描写。如“俯而不答，仰而笑”等细节，生动传神。在层次安排上，他避顺取逆，由近及远回溯往事，使文章波澜顿起。

教战守策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惧。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四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袭，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

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之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哉。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北宋中叶，西夏、契丹对北宋的威胁日益严重。宋朝统治者仍然不修武备，只以岁输钱币求得短暂的安宁。本文就是针对北宋这一苟安积习提出来的。

文章先正面提出观点，指出当今最大忧患在于民众“知安不知后，能逸不能劳”。接着列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陈述解除军备，祸患无穷的教训。再用养身作比，阐明百姓只有经过军事训练才能适应战争的观点。继而结合分析“势必至于战”的形势，提出教民战、守的具体措施。文章立论深刻，说理透彻。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欲？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岁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

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的中央机关。

本文旨在阐明“道可致而不可求”和“学以致其道”的见解。文中开篇巧用譬喻，以盲人识日的荒唐行径，形象地说明了求道之难甚于盲人识日，脱离实际而自以为是，就无异于“眇者”猜日，批判了只求一点不及其余的认识方法。作者还以“南方没水”为喻说明掌握客观事物必须通过实践，循序渐进，认真学习，否则就如“北人学没”，在现实中碰壁。文章比喻生动形象，说理深入浅出，挥洒自如。

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此记写于嘉祐七年（1062），作者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这年春夏之际，正当天旱，庄稼急需雨水，老天连下三场及时雨，于是官吏庆贺、百姓雀跃。而府衙内亭子恰好落成，作者喜极，便用“喜雨”名亭。文章紧扣亭名，抒写雨水与民生的关系，表现了作者与民同忧乐的情怀。

此记题为记亭，实则写亭笔墨甚少。文章先引用三则古例说明以雨名亭的用意是“志喜”。接着写所喜之事，再写一片喜情，最后回到亭名上来。中间写所喜之事，已是字里行间喜气充溢，作者犹嫌表达不够充分，又借亭上对话、歌词内容来反复渲染，说尽无雨之忧和有雨之乐。文章立意新巧，笔调活泼，语言轻快，喜气动人。

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苏洵之子，苏轼之弟。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晚年居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自号颍滨遗老。其文深受父兄影响。早期古文议论风发，晚期风格趋于澹泊沉静。擅长各类文体，以策论为最。有《栞城集》等。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廩、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厚教之，又幸矣。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韩琦的接见。文章开篇并不直言干谒之事，而是从自己“生好为文”说起，论述为文须养气，继而说到作家养气的途径，讲述他观山河、求奇闻、见名人、与贤士大夫游的感受，从而点出求见太尉的用意。以下又用高山大河、历史名人作陪，颂扬韩琦才略冠世，以申其仰慕之情。由于作者将其求见之意和写作养气的用心连在一起，这样既抬高了对方的名望，又不失身份，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作者对于“养气”的阐述，是颇值得重视的，对于作家风格与其主观修养、阅历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是很有见地的。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揖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

“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土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滴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元丰六年，谪居黄州的张怀民筑快哉亭，苏轼为亭命名，贬在筠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高安县）的苏辙写了这篇亭记。文章围绕亭名“快哉”运笔，极写亭中所见景色之美和观景之乐，并引出楚襄王和宋玉的对话展开论述，表现了作者不以得失为怀的旷达情怀。这种情绪，是作者与苏轼、张怀民所共有的，貌似乐观旷达，实质上是贬谪之人的相互慰藉。文中写景、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流溢出不平之气。其中写景文字尤为精彩：写江水出西陵至赤壁，引出“览观江流之胜”的快哉亭，是远而近；由亭至亭中所见，则是从大到小；由景写到曾活动于此处的历史人物，是由今及古。文章铺陈有序，雄放中有风趣，句式整齐中有变化。

李格非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字文叔，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后被定为“元祐党人”而罢官。他是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合称“苏门后四学士”。著有《礼记说》、《洛阳名园记》。

书洛阳名园记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澠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本文是附在《洛阳名园记》后的总论。文章先提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继而提出：“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从而点明作《洛阳名园记》的意义所在。并由此抒发感慨，警戒当时公卿士大夫，不可沉醉于园林美景，忘却治理天下的重任。文章借古喻今，因小见大，层次清晰，耐人寻味。

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工书善画，兼通音乐。诗、词、散文都有较高成就，尤其以词著名。其文简洁、条贯。有《李清照集》。

金石录后序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鬲、鬶、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槧。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坏，必惩罚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缪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

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朝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恒，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舫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鬲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远，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蹕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篋，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篋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这篇书序，不仅记录了《金石录》的编撰由来，更以金石书画的聚散为线索，表现了作者三十四年的悲欢离合，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文章叙事中饱含情感。细腻处，娓娓而谈，如数家珍；沉痛处，淋漓曲折，

凄然言外。作者夫妇早年共同生活的情趣，战乱中的惶恐，丧夫之痛及晚年的孤独无依都写得生动感人。对故事情节和细节描写的处理，作者颇有独到之处。如池江头夫妇告别的场面，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人物外貌、环境氛围等，也具体而微地描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有此意。”（王士祯《宫闱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胜语》）

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他是南宋文坛有名的爱国作家，于诗、词、文都擅长，其中以诗歌创作成就最大。散文和其诗一样，主要反映他恢复中原的愿望，语言洗炼，形式多样。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

过小孤山大孤山

八月一日，过烽火矶。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当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过其下，嵌崖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亦与他石迥异。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余尺，丹藤翠蔓，罗络其上，如宝妆屏风。是时风静，舟行颇迟，又秋深潦缩，故得尽见杜老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也。

过澎浪矶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小孤属舒州宿松县，有戍兵，凡江中独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类，皆名天下。然峭拔秀丽，皆不可与小孤比。自数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已非它山可拟。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极于荒残，若稍饰以楼观亭榭，与江山相发挥，自当高出金山之上矣。庙在山之西麓，额曰惠济，神曰安济夫人。绍兴初，张魏公自湖湘还，尝加营葺，有碑载其事。又有别祠在澎浪矶，属江州彭泽县，三面临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胜。

舟过矶，虽无风，亦浪涌，盖以此得名也。昔人诗有“舟中沽酒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传者因为小孤庙中有彭郎像，彭郎庙有小姑像，实不然也。晚泊沙夹，距小孤一里。微雨，复以小艇游庙中，南望彭泽、都昌诸山，烟雨空濛，鸥鹭灭没，极登临之胜。徒倚久之而归。方立庙门，有迅鹢搏水禽，掠江而东南去，甚可壮也。庙祝云：山有栖鹞，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风云腾涌，急系缆。俄复开霁，遂行。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始见庐山及大孤。大孤状类西梁，虽不可拟小孤之秀丽，然小孤之旁，颇有沙州葭苇，大孤则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为南江，盖江西路也。江水浑浊，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过夕乃可饮。南江则极清澈，合处如引绳，不相乱。晚抵江州。州治德化县，即唐之浔阳县，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为奉化军节度，今为定江军。岸土赤而壁立，东坡先生所谓“舟人指点岸如赭”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与江水乱。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才六日，其间一日阻风不行，实以四日半溯流行七百里云。

这篇游记，以行程为线索，先写烽火矶的奇异景色，次写小孤山的峭拔秀丽，继写澎浪机的无风浪涌，最后记大孤山的壮丽开阔。层次清晰，散而

不乱。文中写景善于抓住景物特点。写烽火矶突出其“奇”，写小孤山突出其“秀”，写大孤山突出其“壮”，各具特色，各尽其妙。作者每到一处，顺便对当地有关历史轶闻古迹加以考释，结合游踪，信手拈来，笔调轻松自如，与写景文字形成有机整体。这种写景与考释相结合的写作形式对后世日记体游记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官至秘阁修撰。他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集注》影响甚大。为文长于说理，写景之文清新可喜。有《朱文公文集》。

百丈山记

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

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夏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淙淙然。度石梁，循两崖，曲折而上，得山门，小屋三间，不能容十许人。然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门内跨池，又为石梁。度而北，蹑石梯数级入庵。庵才老屋数间，卑庳迫隘，无足观，独其西阁为胜。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乃为前所谓小涧者。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乃壁其后，无所睹。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

出山门而东，十许步，得石台。下临峭岸，深昧险绝。于林薄间东南望，见瀑布自前岩穴瀉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殫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若涌或若，顷刻万变。台东径断，乡人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于其东，水旱祷焉。畏险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

余与刘充父、平父、吕叔敬，表弟徐周宾游之。既皆赋诗以纪其胜，余又叙次其详如此。而最其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因各别为小诗以识其处，呈同游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记。

这篇游记以作者的行踪为线索，井然有序地介绍了百丈山的诸多胜景。用笔繁简得当，绘景准确生动。作者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予以客观的摹写，由石磴的险要入手，写出石梁的幽深、涧水的清澈、石屋的小巧、石阁的寂清。然后用浓墨重彩绘出瀑布的恢宏璀璨、石台的高峻崔嵬、云海的奇幻多变。结尾介绍同游三人及其作记的目的。着墨或浓或淡，记景有主有次，态度从容纾徐，景色多变引人入胜。

岳飞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他英

勇善战，治军严整，体恤士卒，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金英雄。所作诗、词、文大都表现了他抗金复国的坚强决心，饱含着奋激昂扬的感情。作品大都散见《金陀粹编》。

论马

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臣有二马，故常奇之。日瞰豆数升，饮泉一斛，然非清洁宁饿死不受，介冑而驰，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余里，始振鬣长鸣，奋迅示骏，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为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值复襄阳，平杨么，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跃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取为马，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

本文题为论马，实是论人。作者先提出“驥不称其力，称其德”的观点，再用良马饮食需求甚多甚精，不逞一时之快而能致远与驽马粗食滥饮，“好逞易穷”，组成对比，说明良马应有好的待遇。作者实质上论述了怎样识才与育才的问题，所说之理，显然与韩愈之意相近（见韩愈的《杂说之四》）。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官至右丞相。举兵抗元，兵败被俘。为元人囚禁三年后从容就义。其兼工诗、文、词，作品大多抒发其“忠肝义胆”。有《文山先生全集》。

指南录后序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阍，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

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问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门，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本文概述作者出使元营、被扣押、中途逃归的经过和九死一生的遭遇，最后说到编辑《指南录》诗集的目的、体例，表现出他守义不屈、坚贞不渝、百折不挠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文章叙事、议论与抒情相互结合，叙事简明扼要，议论透彻深刻，而悲壮激越的感情始终贯注在其中。文中多用排比句，气势磅礴，如波涛汹涌。其中一节连用二十九个“死”字，情感奔放，浩气逼人。

正气歌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还，腥臊纆垢，时则为人气。或圜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尔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本文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以邪气反衬正气，在正邪的相搏中，展示正气的强大。文章先写七种恶气的肆虐，把环境的险恶污浊写到极至。随即笔锋一转，反映出作者的从容，充分显示出以一敌七的正气的至大至刚，也表

现出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毅顽强的意志。文中多用短句，读来铿锵有力。

谢翱

谢翱（1249—1295），字皋羽，晚号晞发子，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南）人。元军南下，率乡兵数百人投文天祥，为其谘事参军。宋亡不仕，漫游两浙山水以终。诗文峭拔峻刻，格调沉郁悲凉。有《晞发集》。

登西台恸哭记

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

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

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浚。登岸，谒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丙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眷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滃沱渟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余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余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著兹游之伟。”余曰：“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余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

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也。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

本文为作者登西台哭祭文天祥后所作，它写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灭亡的无比惋惜，对文天祥这位民族志士的深切哀悼。文中运用曲笔晦笔，借助景色的描绘和场面的渲染，把作者郁积已久的一腔沉痛和哀思充分传达出来。特别是哭祭时对江山云气等的状写，同文章语气间沉郁悲凉之意融为一体，无情有情，仿佛天地为之动容，千百年后，还能使人想见作者当时的情怀。

